

# 城镇居民家务劳动动态考察

王 亚 林

本文通过作者分别于1980年和1988年在北部边疆地区两次抽样调查所获资料的比较研究,从城镇居民家务劳动的时耗量、活动结构、内容及人们对家务劳动繁重程度主观感受等多侧面,动态地考察了城镇居民家务劳动状况的变化轨迹。指出,在我国第一个改革十年中,城镇职工家务劳动状况的改善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社会政策的调整以及发生在“家庭里的工业革命”有直接关系。同时也指出目前城镇职工家庭劳动负担仍然是“超载”的。作者从提高家务劳动社会化替代程度,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正确解决妇女就业问题等方面提出了改善家务劳动状况的措施。作者还指出,在未来的十几年中应注意不能脱离国情实际去追求家务劳动时间的缩短。在发展家用器具上,要把“劳动节约型”和“资源-资本节约型”结合起来。

作者:王亚林,男,1941年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家务劳动是为满足居民个人和家庭成员的物质生活和日常生活需要所进行的自我服务性劳动。在通常情况下,它不被纳入社会的经济计划和管理范围之内,属于非规范经济活动。但是,这种自我服务性质的劳动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它既是人们全部生活结构中不可替代的活动,同时又是社会再生产中不可缺少的活动,因此家务劳动日渐成为社会学以及多种学科研究和实证考察的对象。

1980年10月,我们曾在我国北部地区哈尔滨、齐齐哈尔市采取分类随机抽样的方式对2000余名职工的家务劳动状况进行了调查。据我们所知,这是我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社会学者对家务劳动所做的较早一次实证研究。1988年10月,我们又在这两个城市采取调查员逐户访谈的方式调查了500户居民家庭(其中哈尔滨市为300户,齐齐哈尔市为200户)的500名职工家务劳动状况。除此之外,也在牡丹江、佳木斯、鹤岗和讷河、富锦、尚志、宁安七个不同类型的城市(镇)进行了家务劳动状况的抽样调查,共获有效样本1000份。这两次调查使我们获得了有关家务劳动的丰富信息,加上这个期间天津、上海等地形成的家务劳动调查资料,基本上可以反映我国城镇(特别是北部边疆地区)居民家务劳动状况在改革的第一个10年中的变化轨迹,并使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料对城镇居民家务劳动的质与量及其如何改善家务劳动状况做些比较研究。

## 一、十年改革:家务劳动的变迁轨迹

1980年至1988年,城镇居民的家务劳动状况发生如下四个方面的变化:

1. 家务劳动时间消耗的变化。1980年我们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两市调查的结果是,男女职工平均每周一天内的家务劳动时间分别为3.9小时和5.2小时,这个数字同美国、法国、苏联、捷克等国相比,男职工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多2.5小时以上;女职工多0.9—

1.9小时，一年中男、女职工分别比这些国家多消耗1387小时和329—693小时，成为影响男女职工闲暇时间占有量少的重要因素。

1988年我们在这两个市重新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男女职工家务劳动的时间消耗明显减少，男女职工平均每周一天的家务劳动时间消耗分别减少1.39小时和1.58小时，（见表1）一年中分别减少507小时和577小时。

**表1 1980年和1988年哈尔滨、齐齐哈尔市  
男女职工每周平均一天中家务劳动时间消耗比较（小时）**

	1980	1988	1988年比1980年 减少时数
男	3.9	2.51	1.39
女	5.2	3.62	1.58

从全省9城镇来看，男职工每周家务劳动时间总量为18.11小时，女职工为24.73小时，平均每周一天的男职工家务劳动时间为2.59小时，女职工为3.53小时，男女平均每月一天的家务劳动时间为3.07小时。

家务劳动时间减少和闲暇时间的增多呈现很大的相关性。例如，哈尔滨、齐齐哈尔两市8年中男女职工平均每周一天的闲暇时间分别增加0.95小时和0.89小时，一年中分别增加346.75小时和329.85小时，其中在男职工家务劳动时间减少省下来的时间中有72.51%用于闲暇活动，女职工有53.29%用于闲暇活动，其余省下来的时间主要用于满足生理需要时间上。1980年两市男女职工满足生理需要时间为9.4和9.1小时，1988年为9.64小时和9.60小时，一年中分别增加87.6小时和182.5小时，各占家务劳动省下来时间的17.28%和31.62%。两市职工8年中所增加的闲暇时间和满足生理需要时间分别占男女职工家务劳动省下来时间的89.79%和84.91%。这一数字变化所显示的最直接意义是：在改革的10年中，城镇职工为一家人的口腹之计而耗费大量时间操劳、并挤占闲暇时间和满足生理需要时间的状况明显缓解，生活时间结构向合理化的方向转化。

2. 家务劳动结构的变化。在1980年至1988年的两次调查期间，城镇职工不仅家务劳动的时间消耗明显降低，而且家务劳动结构和活动种类也发生了变化。我国目前城镇职工家务劳动基本活动种类主要用于吃、穿上。但8年中，用于做饭和缝、洗衣服上的时间消耗比例已有所下降。（见表2）

**表2 1980年和1988年城镇职工用于做饭和缝洗衣服时间占整个家务劳动时间的比重**

	男		女	
	时间（小时）	%	时间（小时）	%
1980(哈尔滨、齐齐哈尔)	13.2	48.2	19.3	58.7
1988年				
①哈尔滨、齐齐哈尔	7.3	41.97	12.97	51.12
②九城镇	7.5	41.4	12.74	51.4

这个统计结果表明，8年中城镇职工不但用于做饭、缝洗衣服上时间消耗的绝对值明显降低，而且在家务劳动时间总量中的比重也有所降低。比重增加的活动种类有：（1）购物时间所占比重增加。8年中男职工用于买东西的比重由15%增加到18.3%，女职工由8%增加到12.76%。而这种比重的增加又是在购物条件便利和很少需要排长队情况下出现的，这

和8年前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短缺,买东西常常要到很远距离和动辄排长队的情况是有很大不同的。购物时间比重的增加主要是增加到购物的频率和挑选商品上了。这反映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依赖于市场。(2)干杂活的时间比重上升了。1988年同1980年相比,男女职工由12.1%上升到24.7%。这反映城镇职工家务劳动活动种类拓宽了,用于满足吃、穿以外的家庭自我服务需求增多了。

3. 家务劳动内容的变化。与家务劳动结构和活动种类发生变化的同时,家务劳动的内容也改变了。80年代以前,哈尔滨流行这样一句顺口溜:“苞米碴子的肚子,涤确良的裤子”。哈尔滨人爱穿,但那时人们要想在穿上改善一下,就得在吃上节省一下,吃粗茶淡饭。8年以后,这种局面已经明显改观,人们在吃、穿上讲究多了。在吃上用于加工细做、烹调可口饭菜上的时间增多了;在穿上用于精洗熨烫上的时间也增多了。过去北部边疆地区男子汉常干的杂活是挖菜窖、保管越冬菜、制做煤坯之类重活,如今,则主要用于室内装修、美化家庭环境、修理家用电器等一些体力消耗较轻的活上了。

4. 城镇职工对家务劳动繁重程度主观感受的变化。由于上述客观指标的变化,人们对家务劳动繁重程度的主观感受也发生了变化。1980年在我们调查的男女职工中,90%的职工认为家务劳动负担沉重。当时的典型说法是:在一天之中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战斗的早晨,紧张的中午,疲劳的晚上”;而在一周中又是“战斗的星期六,紧张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1988年调查的结果是:城镇职工感到家务劳动有一定困难和困难较大的占52.9%(男职工为52.29%,女职工为54.9%),其中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两市为55.82%。(见表3)这表明城镇职工对家务劳动沉重感的程度有所降低。过去,家务劳动主要是解决人的温饱问题,现在人们开始“寻找回来的世界”,生活上讲究起来,因而介绍各种生活知识的书刊大受人们的欢迎。

表3 黑龙江9城镇职工对家务劳动困难程度的选答

	无困难	有一些困难	困难较大	未填答	总计
人数	457	488	41	14	1000
%	45.7	48.8	4.1	1.4	100

归结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的第一个10年改革中,城镇职工家务劳动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发生了变化。在数量上体现为家务劳动时间消耗的明显降低;在质量上体现为家务劳动活动结构、种类和内容以及主观感受的变化。家务劳动体力和精力消耗程度的相对减轻、时间消耗的降低,都会对闲暇活动的数量和质量以至整个生活质量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

## 二、城镇居民家务劳动的个体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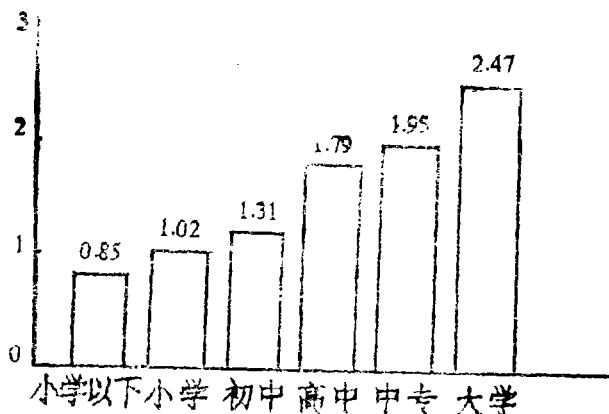
以上是我们就样本总体对城镇职工家务劳动的变迁轨迹所做的一般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从性别、年龄、职业、地域、婚姻状况等因素和家务劳动的相关性做些具体的社会学分析。

A. 1980年和1988年两次调查表明,我国目前几个主要职业群体(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行政人员和知识分子)之间家务劳动时间差别不明显。1980年每周平均一天的家务劳动时间之差不超过0.4小时;1988年的调查不超过0.5小时,这反映了我国各社会群体生活条件的“均等”化趋向。相比较而言,知识分子的家务劳动时间偏长些。但是,在不同群

体内部各个家庭之间，家务劳动时间的长短却有较大差别，周总计标准差在10—23小时。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如：和个人的持家能力如何、生活方式特点和价值取向如何都有关。同时在我国，职工的福利主要同所在工作单位的条件有关，由于有些单位握有“实权”，方方面面的关系比较畅通，容易为职工谋得正常渠道以外的好处，如奖金发得多，经常分发家庭所需各种实物和年节所需的副食，可以不到市场上去购买等等；而有的单位职工却享受不到这些好处，一切生活所需全靠职工个人去解决。因而城镇职工生活福利（包括减轻家务劳动负担的服务）的差别常常不表现在大型社会群体上，而是表现在单位之间。值得提及的是，在1000份样本中有29名个体从业者，他们的每周家务劳动时间为14.23小时，明显少于上述几个基本职业群体，但他们每天的劳动及经营活动时间却比其他职业群体长1.3小时。个人收入多了，可以靠花钱“替代”劳务。

B. 调查表明，不同文化程度的城镇职工之间的家务劳动时间总量消耗没有明显差别，从大学到小学各文化群体之间每周家务劳动的标准差仅为1.002小时，但在总体时间结构中，文化程度越高的职工，用于对子女辅导教育上的时间越多。父母的文化程度同用于子女教育上的时间成正相关关系（见图1）。这反映文化程度越高的家长越注意家庭人口素质的再生产。他们用于打扫室内卫生和干杂活上的时间要少些，但在做饭、购买上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另外，我们调查的九个城镇不同地区之间，居民在家务劳动时间消耗上有一定差别，但把5个城市和4个镇相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别又很小。

图1：黑龙江省9城市不同文化程度的父母用于子女教育上的时间



C. 从家务劳动和年龄与婚姻状况看，从事家务劳动最少的是25岁以下的年龄组，平均每周一天的家务劳动时间为2.4小时。26—50岁的女职工家务劳动时间偏长。但在各年龄组中，家务劳动时间最长的是61岁以上的年龄组，每周平均一天中男子为3.72小时，妇女为5.87小时。如果把工作日和休息日分开做一下考察则可以看出，该年龄组在休息日和其他年龄组差别不大，但工作日的差别很大，男子为3.49小时，妇女为5.72小时，分别比总样本平均数多出0.9小时和2.19小时。这就是说退休了的老龄人口担负起了更多的照顾家庭的责任，他们在家里找到了“余热发光”的角色地位。

从婚姻状况来看，35岁以下各年龄组人口中，未婚人口家务劳动时间不到已婚人口的2/3，但36岁以上单身妇女每天家务劳动时间长达4.79小时，每周家务劳动时间长达33.56小时。她们的时间耗费多，主要是在购物和做饭上比总样本平均多一倍。比如，城镇居民每周

购物的时间平均为3.25小时,她们为7.16小时;做饭时间一般为7.66小时,她们为15.16小时。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维持一人生计全部家务都只能由自己干。这就形成了家务劳动时间最长的一个特殊群体。

D. 1980年和1988年我们的两次调查显示,北部边疆地区城镇男女家务劳动时间消耗之比大约为2:3,高于其它城市(如上海市为1:2)。这大体反映了北方地区特殊的生活条件和文化特征。但全国各地的调查显示:中国男女家务劳动的比例高于苏联、美国、波兰、捷克、东德和西德等国的比例,这些国家男女家务劳动之比大体为1:3甚至1:4。这反映中国有更多操持家务的“模范丈夫”。

### 三、城镇居民“家庭里的工业革命”

我国城镇职工家务劳动时间的减少和繁重程度的降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社会因素是,10年改革中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社会政策的调整,对人民生活改善的关注。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最突出的一点是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我国城镇发生了一场家庭的“工业革命”。

在8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城镇家庭在从事家务劳动时,尚很少使用家用电器,那时,人们在谈论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时,还象在谈论天上的神话,当时人们的“三大件”概念还是自行车、收音机和手表,绝不会想到这些电器很快就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从全国的统计资料上看,1981年全国城镇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洗衣机6.31台,电冰箱6.31台,到1988年80%以上的家庭有洗衣机,52%家庭有电冰箱(京、津、沪、穗地区达到80%以上),绝大多数家庭有各种电炊具。从我们在黑龙江省九城镇1000户居民家庭的调查看,1988年每百户拥有电炊具86.3个,电冰箱37台(因北方地区结冰期较长,从购买意愿调查看,只有56%的居民认为家庭有购买的必要,所以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除此之外,厨房电动排油烟机、小型电热水器、吸尘器、空调机、电吹风机、录象机等等也以大幅度增长的步伐进入城镇家庭。1988年我们调查的1000户居民家庭中,仅同家务劳动相关的日用电机具平均每户支出费用就达到193.19元。由于家用电器的增多,这1000户居民用电量自1985年以来平均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

从国外看,家庭生活电器化发展一般经历三个阶段:(1)初级阶段为使用照明和耗电、耗资少的收音机、电风扇、电熨斗、电视机、洗衣机等;(2)中级阶段为使用耗电较多的电冰箱、厨房电动机、小型电热水器、空调器等;(3)高级阶段为电气取暖和家庭生活的全面电器化。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进入了第三阶段。我国城镇多数家庭在不到10年时间里大体上已完成了第一阶段,并正向第二阶段过渡,发展速度之快在世界上也是个奇迹。洗衣机代替搓衣板,电冰箱代替了挖菜窖,各种家庭日常生活机电设备的使用不但节省了家务劳动时间,而且也减轻了体力和精力消耗,使人们有时间和精力从事闲暇活动。这就给城镇居民的家庭生活方式带来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静悄悄的革命。

家务劳动负担的减轻除同家务劳动用具条件大大改善有关外,还同下列因素相联系:

第一,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服务业网点增多,居民日常生活的方便程度大大提高。1980年我们在调查哈尔滨、齐齐哈尔两市职工家务劳动繁重原因时曾做了这样的描述:

“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社会组织工作差，商业社会服务事业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20多年来，城市人口猛增，就业率不断提高，城市人民日常生活服务事业本来应当相应发展，结果却发生了逆向的变化。以1980年与1957年相比，黑龙江省人口增加1.2倍，职工人数和社会购买力增加3倍多，但商业网点反而减少，1980年国营和集体商业、饮食业、服务业零售点3.1万个，比1957年的3.9万个少8000个；1957年城乡每个商业零售网点平均服务人口为640人，1980年增加到1374人。齐齐哈尔市是黑龙江省的第二大城市，1979年商品零售额比1949年增加21.5倍，而商业、服务网点却由1949年的2386个减少到872个，由30年前平均每千人占有9个网点减少到0.75个；浴池由1949年39个689张床位，减少到1979年的8个457张床位。儿童保育、修理加工行业也不能满足需要。社会服务业不但数量少，质量差，而且网点分布不平衡，服务方式落后，不适应现代城市生活的节奏。从全国来看，现有城市职工1亿多，其中从事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的只有1000余万，这个比例不仅远远低于工业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这就形成了一方面城市尚有大量待业青年需要安排，一方面消费者希望提供的方便服务和劳务交换又没有人去做的状况”。<sup>①</sup>

1988年从我们调查的九城镇1000户居民来看，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1000户居民购买商品和日常生活服务用品的活动半径不超过十几分钟。过去商品短缺，虽然许多商品凭票供应，但排长队的现象很普遍，现在这种现象不多了。过去北方地区出差去北京从肥皂到鱼、肉、服装、日用品都要大包小包地往回买，现在只要有钱都可以在本地买到。与此同时，人们用于日常生活的劳务支出也增长较快。在我们调查的1000户居民中，1981年以来用于修理服务费支出每年以13%以上的速度增长。同时，人们生活需要的满足依赖社会服务的程度也提高了。其中依赖社会服务程度最高的是“穿”。（见表4）

表4 黑龙江省城镇居民衣物添置方式

添置方式	5城市（哈、齐、牡、佳、鹤）		4镇（讷河、富锦、尚志、宁安）	
	人数	%	人数	%
1. 商业购买	439	54.88	99	49.50
2. 服装店制做	209	26.13	62	31.50
3. 花钱裁自己做	79	9.88	19	9.50
4. 自己制做	50	6.24	16	8.00
5. 其它	18	2.24	3	1.50
6. 未填答	5	0.63	1	0.50
合计	800	100	200	100

表4表明，在服装添置方式上，5个城市居民依靠在商店购买和到服装店制做的，占居民总数的81.01%，另外有9.88%的居民花钱裁自己做，也在一定程度上依靠社会服务。4个县镇居民的情况和5城市类似，依靠在商店购买和到服装店制做的占80.5%，尚有9.5%的居民花钱裁自己做。上述数字表明，无论城市还是县镇，在“穿”上依赖社会服务的程度是相当接近的。我们也分析了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他们之间的差别主要在购买衣料的质量和价格上，而在依赖社会服务的程度上差别也不大。

第二，城市公共设施建设事业有一定发展。文化大革命中城市公共设施欠帐太多，恶化了居民的生活条件。齐齐哈尔市作为百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是全国城市公共设施建设欠帐

① 王亚林：《城市职工家务劳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太多的城市之一。1979年全市日用水量15万吨，实际送水能力只有5万多吨，居民家庭自来水普及率仅有54%。全市污水管分布面积只占城区的10%左右，平房区甚至连厕所也不足。当年哈尔滨自来水普及率为71%，尚有几十万人用不上自来水，而且常因供水不足而延长了洗衣做饭时间，为着晚间接水，又常常影响睡眠。这些都多耗费了城市居民不少业余时间 and 精力。

在改革10年中，各级政府在加强公共设施建设上为人民做了不少实事。比如，黑龙江省城市自来水日供应能力1980年为44.5万吨，1987年为360.1万吨，增加了8倍。在我们调查的5市4镇1000户居民中，家庭独用自来水户占84.92%，合用自来水户占6.79%，没有自来水户占8.29%。从使用液化气的人口看，黑龙江省城市1981年为64.33万人，占城市人口的9.8%，1987年为504万人，占城市人口的40.40%。目前，城市人口中使用液化气的比例还在以较快速度上升。就目前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看，自来水的普及和液化气民用燃料的使用，是使家务劳动负担减轻的主要因素。除此之外，城市交通、通讯设备也大有改进，全国投入营运的市内公共交通工具数1987年比1980年翻了一番，城市每百人电话拥有数1988年达到6部，这些都助于减轻城市居民的家务劳动负担。

第三，居民住房条件有所改善。居住条件不良，是加重城市居民家务劳动负担的重要因素。城市住房拥挤，缺少必要设备，是我国长期形成的社会问题。1980年我们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两市调查，每千户职工中能住有厨房、厕所、上下水道和暖气设备独立单元房子的仅为261户，没有上述设备或不齐全的户为739户。上述设备齐全的户每个职工一天的家务劳动时间为3.65小时，上述设备不齐全的户都为4.61小时，两者相差近1小时。1988年，哈尔滨、齐齐哈尔居住独立单元的上述设备齐全户增至543户，这也是使家务劳动的时间消耗和精力消耗降低的因素之一。

#### 四、家务劳动：依然是“超载”的负担

以上对1980年和1988年城市职工家务劳动状况的动态分析使我们看到，我国城市职工的家务劳动负担呈明显减轻趋势。但就其现实状况看，城市职工的家务劳动负担仍然是沉重和“超载”的。家务劳动的过量消耗仍然是导致城镇居民闲暇时间占有量偏少的重要因素。

1. 我国城镇职工家务劳动时间消耗在一天的生活时间结构中的比例仍然偏高，男职工占用率为10.79%，女职工为14.71%，而闲暇时间男女职工的占用率分别只有16.48%和12.03%，其中女职工的家务劳动时间超过闲暇时间。在城镇职工一天的时间结构中，除职业劳动时间外，家务劳动时间消耗的多少成为我国目前城镇居民闲暇时间占有量偏少的第二大因素。用于满足社会的精神生活的时间偏少，必然限制人们个性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特别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计算家务劳动时间消耗，更可以看出其消耗的过量性质。在我们调查的1000户居民中，每家平均人口为3.59人，就业人口为2.04人，男女职工平均每天家务劳动时间为3.07小时，按2.04个就业人口计算，每天花费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为6.26小时。从我们调查看，29.5%的家庭还有不上班可负担家务劳动的人口，他们每天从事家务劳动时间为5.8小时，如果把他们的家务劳动时间也算上，每户一天家务劳动时间为7.99小时。这意味着挤占了全家人不少的闲暇时间总量。

2. 城镇职工休息日的家务劳动时间消耗过长。到1988年，北部边疆地区九城镇的男职工在休息日的家务劳动时间为4.55小时，女职工竟长达8.04小时。这说明“不得休息的休息

日”的状况仍未改变,十分不利于职工体力、精力的恢复和精神需求的满足。

3. 在城镇居民一天时间支出中,还存在“隐性”家务劳动时间消耗。我们在分析我国城镇居民时间预算时曾指出,我国城市职工的时间预算存在“潜结构”。存在“潜结构”的时间之迷就在于无形损耗掉的工作时间中一部分用于上街买东西、干私活上了。这种无法精确计算的“隐性”家庭劳动时间消耗的存在表明,部分城市职工家务劳动繁重程度的缓冲是以工时的损耗形式实现的。但对于工时限定严格和事业型的人来说,这种缓冲器是不存在的。因此,他们的家务劳动负担会更加突出一些,闲暇时间占有量更少一些。另外,城镇职工的家务劳动虽然同改革前和改革初期相比已明显减轻,但现在人们的价值取向更注重生活素质的提高,在一天的时间结构中开始注重闲暇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家务劳动时间过量消耗的承受力也降低了。

## 五、家务劳动状况的改善

家务劳动时间消耗是社会时间中所必须的消耗。但其过量消耗对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发展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应从我国的国情实际出发,研究如何改善家务劳动的条件,减少家务劳动时间和精力、体力消耗,以便使家务劳动为城镇居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提供应有的条件和良好的环境。关于如何减轻城镇居民家务劳动负担问题,近些年来在社会学界多有讨论,我们着重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 (一) 关于提高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替代程度

在我国,减轻城镇居民家务劳动负担,根本途径仍然是加强社会分工,大力发展日常生活服务事业,提高城镇居民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替代程度。

发展减轻城镇居民家务劳动负担的社会服务事业,要从居民的实际需要出发。前面已经说过,目前我国北部边疆地区城镇居民在穿上依赖社会提供成品的程度较高,达到80—90%,完全由自己做衣服的仅占6%。相对比较起来,在耗费时间多的“吃”上,利用社会服务的程度尚低。黑龙江省九城镇居民每天消耗在做饭上的时间占整个家务劳动时间构成的34.7% (这个比重高于苏联的31.7%和美国的26.5%),和精于烹调的上海人的35%相近。上海和黑龙江省九城镇男女职工每天在做饭上花费的时间比国外城市却多得多(见表5)。

虽然黑龙江人和上海人在做饭上的时间差不多,但两地的文化特点很不同,这必然在家

表5 各国城市居民每日用于做饭时间(分钟)

	苏 联	美 国	西 德	比 利 时	法 国	上 海	黑 龙 江
工作男性	14	7	5	5	9	42	46
工作女性	82	51	54	57	54	84	81
家庭妇女	148	95	140	125	104	—	137

务劳动的活动结构上显现出区别。上海人在烹调上一般来说很讲究,在食品制做的精细加工上花的时间要多些,黑龙江人在吃上不太讲究,一般来说在精加工上花的时间不多,但由于社会服务的粗疏化,使居民在副食、蔬菜的摘洗等粗加工上花的时间却要长些。

从利用社会服务的程度看,发达国家食品经过加工的比例在80%以上,我国在30%左右,北部边疆地区更低些,一日三餐主要靠家庭自己制做。为了把解决吃的问题限制在一定时间内,城镇居民常常采取的办法是(见表6):采取简单加工和经常对付着吃的占63.2%,



这势必影响生活质量。此外，靠到饭店、餐厅、小食品摊就餐的比例只占1.3%。这个比例是很低的。在美国，城镇居民的食品支出中有40%花在家庭以外，日本从1975到1984年每户平均外卖费支出从7.4万日元提高到14.1万日元，增加近1倍，外卖费占整个饭食费的14.9%。

**表6 减少做饭时间采取的方法**

	多用成品、半成品	减少加工程序	到饭店吃	对付着吃	未填答	总计
人 数	352	346	13	286	3	1000
%	35.2	34.6	1.3	28.6	0.3	100

所以，解决在吃上的过量时间消耗，应放在解决减轻城镇居民家务劳动负担的首位。为此，在措施上首先要力争使主食生产社会化。目前北方地区粮店主要还是供应米和面粉，经过加工的一般只有挂面，应逐步创造条件向成品半成品转化。为此，要加快用科学技术装备食品工业的步伐，解决大批量生产问题；要发展和引进物美价廉的风味食品和小吃；要提高肉菜等副食品的加工深度，根据目前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不同家庭口味的多样化，应多提供半成品，使居民买回去就可直接烹调。同时要发展价廉、味美、营养丰富的快餐业和地方风味食品。发展食品服务业，要解决质次、不卫生、价格昂贵问题。近几年城市饭店剧增，但一些饭店争相由大众小吃店经过装修改为豪华饭店，这样就变成以纯盈利为目标了，很少讲社会效益和解决一般市民生活之需。为此，在发展饭店行业上要通过不同利税政策进行导向。对供应人民日常生活之需的食品实行薄利多销和低利税政策扶持其发展；对于豪华饭店采取高利税政策，等等，以确保食品业为人民日常生活服务为主的方向，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好地结合起来。

除重点解决“吃”的普遍性问题之外，还应通过社区服务和兴办家庭服务公司等形式，解决各种居民的劳务需求问题。这些问题有：（1）我国城镇居民中双职工家庭占90%以上，社区服务应帮助他们解决子女的看护、学龄前教育、上学的“带钥匙孩子”吃中饭问题以及其它困难，缓解双职工的社会和家庭双重角色紧张问题；（2）我国大多数城市在2000年前陆续进入老龄社会，对老龄人口的家庭劳务服务应大力加强，如送煤气罐、天冷前封窗户等；（3）要解决病人和失去生活能力的人的陪护问题；（4）随着社会的变迁在城市也将出现一部分单身家庭，社会应考虑他们的特殊需要。

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应发展社区服务和兴办各种形式的家庭服务公司。在这方面各地都有了很好的经验，这些服务机构的服务项目基本上包含了家务劳动的内容，如洗衣、烧饭、打扫卫生、照料老人、陪护病人、照料孩子、服侍产妇，以及搬家承运、油漆粉饰房间、拆洗缝补、修理家具和电器等。社区服务的优点在于服务机构熟悉当地情况，了解服务需求，可以满足当地的劳务需要。通过有组织地为家庭提供各种服务，可以解决不同类型家庭的后顾之忧，弥补社会服务之不足。这些都是一般商业、服务业代替不了的。同时也有助于社会就业问题的解决，改变那种一方面很多人没活干，一方面又很多活没人干的状况，并使社会分工更趋于专门化、合理化。

#### （二）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居民居住条件

改革的10年中，我国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解决住房条件上弥补了很多“欠帐”，人民群众都得到了不少实惠。但相比较而言，居民房屋内部条件的改善（如城镇家庭家用电器的普

及)大于住房和公共设施建设条件的改善。当然多数家庭家用电器的使用又具有超前的性质。据调查,城市居民家庭的电冰箱除年节以外,平时90%的时间是利用不充分的,洗衣机及其它家用电器也有类似的情况。到目前,住房紧张和公共设施不足仍给家务劳动增加了不少负担。从我们调查的1000户居民情况看,(1)1988年独用自来水户占85.1%,公用自来水户占6.7%,无自来水户占8.2%,这种状况同1980年相比有明显改善,但由于供水不足,常有断水和滴水如油情况;(2)无卫生设备户占61%,有浴室和厕所户占3%,有厕所无浴室户占24.8%,有公用卫生设备户占11.1%。这表明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还是很方便的;(3)从取暖设备看,有空调户占0.17%,有暖气户占61.1%,烧火炉、火墙取暖户占38.73%。这就是说,1/3以上的居民户为取暖要花费很大时间和精力;(4)独用厨房户占91.11%,公用厨房户占6.71%,无厨房户占2.18%。这表明仍有部分居民做饭尚很不方便;(5)黑龙江省城市煤气、液化气普及率1987年为40.4%,但县镇的居民要低得多。从上述情况看,城市居民在用水、卫生设施、取暖设施和燃料使用等方面提供的生活方便程度尚有较大差距,这些都加重了家务劳动的繁重程度。从解决措施上看应克服单纯追求经济产值的倾向,注意向发展城镇基础设施上进行政策倾斜;应推进住房改革,消除分配不公现象;城市设施的建设除国家投资外,应本着大家福利大家办的原则,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可多方筹集资金和开展义务劳动。同时应调整某些公用设施收费过低、价格不合理问题,增强公用事业自身的发展能力。

### (三)关于妇女就业问题

近几年,面对着城镇职工家务劳动繁重、特别是女职工双重角色紧张和社会上劳动力市场“太挤”的现象,有人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是“让妇女回家去”。但是,妇女就业如果得不到保障,失去了职业劳动角色,对社会、对家庭以及妇女自身都会产生许多消极影响和社会震荡,这样做也无异于把整个社会重担转嫁到妇女身上,而且事实上也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

首先,妇女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将增加新的就业机会,特别是我国目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仅为25.5%(1987)。这也说明第三产业吸收劳动力的潜力还很大。第三产业和电脑等新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更适合妇女来做。

其次,参加职业劳动已成为绝大多数妇女的共同取向和社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1987年天津市对1000名女工进行了就业意愿调查结果如下:

表7 天津女工对自身就业的看法

	妇女必须就业	妇女不需要就业	未填答	总计
人数	850	125	25	1000
%	85	12.5	2.5	100

此外河北、辽宁等省市的调查结果是,90%以上的妇女坚决反对“妇女回家去”。广大妇女维护自身就业的合法权益的意愿是不可改变的。国家可供选择的政策只能立足在“平等+效率”原则上,对妇女就业一方面运用经济规律加以调节,一方面又要用行政和立法手段保障妇女就业和改善妇女就业的条件。

再次,在中国夫妻“双就业”已相沿成习和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事实。在今后可预见的时期内,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夫妻共同就业仍然是获得必要家庭收入的保证。为了家庭

的利益,人们已经做了共同承担家务的选择。我们在黑龙江九城镇做了如下调查:从表中可以看出,对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家务持同意态度的占95.7%;认为夫妻双方共同从事家务已成为较多和普遍现象的占73.3%,此外尚有18.3%的人认为是部分存在事实,加起来达到91.6%。

**表8 关于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家务劳动的观念和事实调查**

1. 家里的活应该大家一起干 %	不同意 1.2	不太同意 2.0	说不清 0.6	有些同意 8.2	同意 87.5	未填答 0.5
2. 人们已经习惯于共同干家务 %	不存在 1.1	少量存在 0.7	部分存在 18.3	较多存在 32.2	普遍存在 41.1	未填答 0.6

上述因素决定了在本世纪末到下世纪初,中国妇女仍保持就业趋势,这应是分析中国城市家庭问题的一个出发点,也是妇女双重角色问题突出成为中国国情一大特点的原因所在。虽然普遍就业还会带来一些困扰,但总的看对于妇女扩大社会交往,提高自身价值,形成平等的家庭关系和高尚的闲暇需求,都会带来积极后果。所以,解决家务劳动紧张和社会就业压力问题,不能采用“妇女回家去”角色中断的方式,也不能以牺牲家庭成员合理需求的方式解决,只能通过发展家庭服务事业,提高家务劳动社会化水平的途径来解决;同时要改变“一刀切”的单一就业方式,在妇女中可实行弹性工作制、非全日工作制、计时计量工作制,以及对于生育、哺育期妇女采取阶段性就业政策等等,使两种劳动在矛盾中寻求新的平衡。

#### (四) 关于减少家务劳动时耗的适度性

在过去的10年,我国城市家庭家务劳动条件的改善和时间消耗的明显降低,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70%,居民实际收入增长200%的超前消费下实现的。对家用电器的购买热带来了“家庭工业革命”,但每个家庭自我服务需求却没有同步增加。这种落差是构成家务时耗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后人民生活的改善就全局来说一般不会有突发式的机遇。同时随着城市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家务劳动时耗上将发生两个相反相承的过程:一方面生活条件的改善有可能减少家务劳动时耗;另一方面生活条件的改善又将不断增加家庭自我服务的需求和活动种类,导致家务劳动时耗的增加。这个相反相承的变化过程,可以从美国妇女本世纪以来家务劳动的变迁史中得到说明。

1920年至1960年,在美国最早发生了一场“家庭里的工业革命”。过去烧木柴或煤炭的炉子如今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煤气或电炉。过去用金属洗衣板搓洗衣服,现在把衣服仍在缸里,电动洗衣机就可代劳了。干衣机代替了晾衣绳;真空吸尘器代替了扫帚;电冰箱取代了冰柜和蔬菜储藏窖;自动水泵、自来水管和龙头代替了手压泵、水桶和水井。谁也不用再去砍柴和拉柴草了,不用去铲炉灰、拍打地毯或挑水了,甚至要做蛋白糕也不必花一个钟头时间用叉子去搅打蛋清了。然而,美国的家庭主妇们在1960年、1970年甚至1980年用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仍与她们的母亲和奶奶在1910年、1920年和1930年所花的时间一样多。现在在美国一般家庭主妇都拥有一大批电器,其中安装的马达有几十个,电路块数以千计,可每周还是要做50—60个小时的家务。唯一大大缩减家务劳动的时间的变数是就业,在职家庭主妇每周家务劳动时间为35个小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比如,到了本世纪80年代,自动洗衣机成了每个家庭必备的用具,家庭妇女普遍每周洗出的衣物相当于她们母亲通常洗衣量的10倍,没洗衣机前人们一周才换一次衣服,现在差不多天天换内衣,原来送到洗衣店的衣物,现在也自己洗了。再如,吸尘器代替扫帚也有类似的情况,由于现在住房大了又都

铺上了地毯，人们使用的劳动量也大了，等等。美国社会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现代家用电器的使用带来了一场社会革命，其意义不在于家务劳动时间的一味减少，而是生活水准的提高。有了洗衣机、吸尘器、洗碟机和水泵，家务劳动不再象以前那样繁重不堪，这就使得一个妇女可以每天做双份工作而不致累垮，在做了全职工作后，仍可使自己和全家人的日子过得相当舒服。<sup>①</sup>

从我国城镇来看，居民的家务劳动条件改善和家庭内部自我服务需求扩大的两个趋向还将发展下去。消长相抵，到本世纪末和下个世纪初，城镇职工的家务劳动时间消耗虽然同现在比还会有所降低，但每天大体保持在2.5小时左右，其中男职工在2小时左右，女职工在3小时左右，闲暇时间大体在4.0—4.5小时左右。这种时间结构大体符合今后十几年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我们不能脱离国情实际去一味缩短家务劳动时间，因为在今后很长时期内我国仍然面临就业不足和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同时，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和经济的加速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我们尚不可能把有限的资金主要投放到家务劳动现代化手段上。在改善家务劳动条件方面，要尽量减少能源、原料的消耗，注意资本的节约，把发展“劳动节约型”的家用器具和“资源节约型”“资本节约型”家用器具结合起来，同时也要尽量减少实现家务劳动现代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

责任编辑：陈庆利

## 山东省社会学学会举行年会

山东省社会学学会於1990年11月10日至12日在日照市石白港举行年会和理事会，收到论文及调查报告30余篇。会上公布了1990年度社会学优秀著作和论文的评选结果，并颁发了荣誉证书；修改了会章的个别条文；商定了1991年度学会工作和学术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增补了学会理事。

会议围绕《农村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这个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议强调指出，当前我国农村形势是稳定的，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稳定了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但是也应看到，农村社会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利于稳定发展的消极因素。从宏观上看，这些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平衡性上：一是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宏观“跃进”与微观渐进的不平衡性；二是政治形势的全局安定团结与局部矛盾冲突的不相融性；三是人口发展过快、素质较低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的不协调性。从微观上看，这些消极因素主要是1.乱摊派、乱收费依然存在，农民负担过重。2.极少数农村干部以权谋私，吃吃喝喝，干群关系紧张。3.封建迷信活动有所抬头，宗法势力呈发展趋势。4.法制观念淡薄，有些农村社区的社会秩序较乱，发案率降不下来。5.农村基层工作“三大难”（指突击计划生育、调整宅基地、催收提留款）依然存在，其中哪一难都可能激化矛盾冲突，影响稳定发展。

会议认为，要保证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工作。一是必须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二是必须保证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特别是家庭式大包干生产责任制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三是要努力实现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这是保证实现农村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四是要加强对农村社会的控制机制系统。

（王训礼）

<sup>①</sup> 参见R·科恩：《美国妇女家务劳动知多少？》，载《美国传统》杂志，1987年9、10月号。